

文化原动力

The Primary Force
of Culture

吴福平

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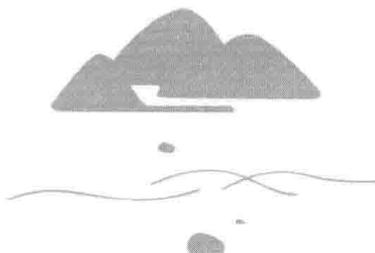
浙江大学出版社
ZHEJIANG UNIVERSITY PRESS

文化原动力

The Primary Force
of Culture

吴福平

著



浙江大学出版社
ZHEJIANG UNIVERSITY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文化原动力 / 吴福平著. —杭州: 浙江大学出版社,
2018. 11

ISBN 978-7-308-18368-0

I. ①文… II. ①吴… III. ①中华文化—研究
IV. ①K20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8) 第 137268 号

文化原动力

吴福平 著

责任编辑 余健波
责任校对 杨利军 李增基
封面设计 周 灵
出版发行 浙江大学出版社
(杭州市天目山路 148 号 邮政编码 310007)
(网址: <http://www.zjupress.com>)
排 版 杭州好友排版工作室
印 刷 浙江新华数码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10mm×1000mm 1/16
印 张 25
字 数 422 千
版 次 2018 年 11 月第 1 版 2018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308-18368-0
定 价 88.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印装差错 负责调换

浙江大学出版社市场运营中心联系方式: (0571) 88925591; <http://zjdxcb.com>

序 言

文化不是文“花”，文化管理重在“化”。

由此决定了，文化路，必然地是一条几无终点的“长征路”。文化长征，对于任何一国、一族、一区、一域乃至于一家人，等等，都可能注定是一场文化苦旅。

这首先是因为，要科学、准确、客观地了解 and 掌握文化的本质、运行机制、基本规律，要对文化展开管理或治理，就必须深入了解和理解整个人类的文明史、思想史、哲学史。

文化管理本质上是对组织内部长期积累和积淀下来的集体意识和无意识的管理或治理。组织文化正是组织内部的这种集体意识和无意识——一股潜藏于组织内部的强大的、无形的力量，即管理视阈的“文化”。所以，1975年 Harrison 首创文化测量工具时，针对的正是“组织意识”(Organizational Ideology)的测量。事实表明，任何一级组织内部的集体意识和无意识，如不加以有效地规训、引导和治理，很多时候极有可能是致命的。管理学上所谓的“组织生命周期”“黄炎培周期律”以及文化“公地悲剧”的存在，很大程度上正是组织内部的这种集体意识和无意识所导致的必然现象。

为了加强文化意义上的集体意识和无意识的研究，并把文化从静态的功能性研究推向动态的规律性的研究和实践，我们偏向于文化的“实践性”定义，即把文化看成是由价值、信仰、习俗、习惯等相当于内在或者说是潜在的规则，即内在制度(潜规则)与知识、语言、法律、礼仪、符号等大体上处于物化或者是外化状态的外在制度(显规则)所构成的规则系统“互动的和”。这是因为，这一定义意味着，实时地流动、迁变的文化机体中，所谓的“文化”，可以由“外在制度”“内在制度”及二者“互动的和”这样三部分内容构成。基于此定义，既可以进一步明确文化动力的来源问题：即“内在制度”与“外在制度”，特别是它们所“互动”出来的那种“和”的状态；而且，通过本研究努力，也可用以深入剖析吉登斯的社会“结构”理论及哈贝马斯的交往

行动理论和生活世界范式,可用以深入解读哈耶克所阐发的“第三范畴”,还可与社会资本、社会质量等当代社会理论概念深度接域。如果文化动力更主要地是由“互动的和”部分生发的精神力量,那么,社会资本、社会质量、社会结构乃至哈耶克所说的对于社会现象研究具有极端重要意义的“第三范畴”研究,也就都进入了我们所定义的文化视阈。并且显见,特别是这一“互动的和”部分,经过长期的沉淀和累积,就可能成为一种集体意识和无意识。

集体意识和无意识的普遍性、特定性、遗传性决定了,文化管理或治理几乎成了一种如哈耶克针对“有机的复杂现象”(phenomena of organized complexity)问题时所说的“绝对困难”。尽管文化是什么的问题,迄今未能达成共识,但是,随着文化管理研究和治理实践的不断深入,特别是在具体工作中遭遇窘境或陷入困境的人,大多在有意或无意间都体察到了文化和文化工作的特殊性,并且可能或多或少地都开始赞赏哈氏的另一洞见:文化既不是人为的,也不是自然的,而是一种“自生自发的秩序”。在我们看来,文化的“自生自发”性,一方面可以说明,任何一种文化,一旦成形定格,就可能具有极强的稳固性、遗传性、自足性,因而看上去便具有自生自发性。也因此而使得运用通常的管理理论和管理工具、方法和手段,一旦遭遇文化,常常要显得捉襟见肘。另一方面,这又可以让我们深切地感受到,即便是文化在本质上的确具有“自生自发”性,也足用以说明,迄今百有余年的文化理论研究,对于文化或文化动力的运行机理、流变机制和基本规律等很大程度上仍缺乏研究、了解和理解,对于以什么“文”来化以及如何“化”等问题,甚或停留在几近于库萨的尼古拉所阐发的那种“有学识的无知”,或者陷于因无视文化的“动态有机性复杂”而出现的“知识的僭妄”,对于任何一种文化的“原动力”及其传导机制的研究,更是迟滞于浅层和浅表。进而,才导致了文化即便在现象层面也常常表现出“自生自发”性,以及如罗伯特·克利加德 1992 年在研究文化与发展二者关系的一部著作中所指出的,今天的文化理论和文化政策实践之间,实际上既没有也难以建立密切的专业联系,更难以做出实质性的文化贡献。

究其原因,可能正是因为我们未能找到文化形成的“初因”。在英国学者 R. W. 费夫尔看来,初因就是一种理解事物方式的主体,亦即是理解事物的出发点,是每一种理解事物方式所依赖的基石和基点。“初因”就如生命科学中的“基因”,正是因为生命科学发现了基因及其活动机理,我们才有重

新设计生命的可能；找到了解释和理解事物的“初因”——如果我们还能幸运地找到其活动规律，则将意味着我们不仅能够理解所有的理解方式，而且也有可能对理解方式进行重组与重构。因而，文化的“初因”就可以进而看成是文化的“原动力”；而文化上“自生自发”现象的存在，则只能说明，人们可能迄今也未能找到正确的和积极意义上的文化原动力。

亚里士多德早就认识到，思维是自愿的还是不自愿的，一直是一个问题。在康德那里，意志自由是道德实践的充分必要条件。叔本华坚信人的自由和行为的必然性相一致的康德学说。他在《论意志自由》中区分了自然的自由、智力的自由和道德的自由三种自由，基本结论是，在经验世界，不仅自然的自由是不可能做到的，智力的自由和道德的自由也同样，由于人的认识能力长期地或者只是暂时地受到了破坏，或者是由于外部环境在个别情况下扭曲了对动机的把握，自由便是不可能的。由此看来，文化作为一种“自生自发的秩序”而存在，还可用以说明，在文化上，人们的“意志”很大程度上是不自由的，甚或可以说是先天地不自由的。意志不自由的直观的和现实的表现，正体现于人们在文化上往往缺乏批判和反思的精神和能力，这就可以进而理解，为什么批判和反思可以成为现代主义的文化主题，也成为后现代主义的有力武器。本研究进而认为，丧失了自由意志（主要是求“善”）、反思（主要是求“真”）、批判（主要是求“美”）的精神和能力，丢弃了对真、善、美的不懈追求，则文化动力将无从谈起。因为，不论时代如何变迁，求真、求善、求美当是永恒的主题。因此，一般性的文化初因或基因，并非都能成为文化原动力，而只有那些具有自由意志（求善）、反思（求真）、批判（求美）精神的初因或基因，才有可能成为真正的文化原动力或其核心要素，并进而发挥出文化动力的功能和效用。

文化说到底便是自然的“人化”，或者如贺麟所说，文化是人化的“自然”。文化的，就是劳动的，实践的，从来就在“人间”。由于康德、黑格尔等古典哲学们所谈论的“自由”大都在“天国”，在整个人类思想史上，唯有马克思主义在对古典哲学和资本主义的反思和批判中，让“自由”进入了有血有肉的人的历史的实践长河，也让我们认清了追求真、善、美的统一对于人的自由和全面发展的重大意义。马克思主义的文化观表明，没有比共产主义社会昭示的真、善、美更值得追求的文化理想了，共产主义的真、善、美的理想，是真正的、内容意义上的文化原动力。因此，本研究所提取的康德“纯粹实践理性的动力”——“自由意志”（求善），黑格尔“对事物作思维着的考

察”——“反思”(求真),哈贝马斯“行动的合理性和社会合理化”——“可批判性”(求美)等文化原动力的核心要素,也仅仅可以视作形式意义上的文化原动力。

进一步的研究表明,自由意志(求善)、反思(求真)、批判(求美)能力的大小强弱,不仅直接决定了以价值“认同一认异”、“内敛—外张”为两个对立维度建立坐标系区分出的凝聚力、传播力、学习力、革新力等四种不同类型的文化软实力的强弱,而且在很大程度上也决定了一区、一域、一族、一国在基于文化的实践性定义而区分出的“超”(S)文化态、“合”(I)文化态、“和”(H)文化态、“纯”(P)文化态等四种“文化形态”中的流变、演化状况。基于此,本研究在构建以自由意志为核心、以批判和反思为两翼的文化原动力模型的基础上,试图揭示在任何一个具有动态有机性复杂的文化机体内,文化原动力的核心要素:自由意志、批判和反思能力的大小强弱所导致的“超”(S)文化态、“合”(I)文化态、“和”(H)文化态、“纯”(P)文化态等四种“文化形态”的流变趋向,以及在凝聚力、传播力、学习力、革新力等四种“文化软实力”中的传导机制和基本规律,揭示文化原动力核心要素的传播路径和作用机理;进而,把文化原动力、文化形态、文化软实力视作文化动力系统分析的主要途径和基本要素,并展开基于多国案例的文化原动力及其传导机制的研究。

目 录

导论 文化长征:一种文化研究的历史回顾	1
一、研究背景与意义	2
(一)研究背景	2
(二)研究意义	4
二、文献综述	5
(一)文化和文化动力的内涵	5
(二)文化动力研究的基本路径	11
(三)文化动力研究的学科视野	17
(四)已有研究存在的主要问题	28
三、研究内容与方法	31
(一)主要研究内容	31
(二)主要研究方法	33
(三)本研究技术路线	34
(四)研究的重点、难点、创新点	34
第1章 文化动力研究:哲学基础与可能路径	40
一、“‘零’存在机制”及其存在论意义	41
(一)中西哲学中的“差别—联系”论	41
(二)“‘零’存在机制”的哲学基础和数理内涵	48
二、中西哲学中的“一”及“同一”	62
(一)从老子的“抱一为天下式”到西方的“同一”哲学	63
(二)“同一”哲学与西方理性的四次飞跃	64
(三)“同一”哲学与西方哲学思想的四度提升	65
三、虚数 i 与 $-i$ 及老子的“道”	71

(一)群论的哲学内涵:多等于多,多即是一,一即是零·····	72
(二)虚数 i 与 $-i$ 及《易经》“一阴一阳之谓道”新解·····	76
四、老子的“三”及“势成之”·····	80
(一)老子“三”的形式意义·····	82
(二)老子“三”的内容意义·····	85
(三)老子的“三”和“势”·····	90
五、基于“‘零’进制”的“易图”推演·····	95
(一)“‘零’进制”的基本内涵·····	96
(二)基于“‘零’进制”的河图、洛书、五行及其生克解读·····	97
(三)基于“‘零’进制”的周敦颐《太极图说》解读·····	99
六、本章小结·····	102
第2章 文化原动力模型构建 ·····	105
一、文化原动力核心要素及其哲学基础·····	106
(一)康德“纯粹实践理性的动力”——“意志自由”·····	106
(二)黑格尔“对事物作思维着的考察”——“反思”·····	111
(三)哈贝马斯“行动的合理性和社会合理化”——“可批判性”·····	115
二、文化原动力模型构建及其意义阐释·····	121
(一)以自由意志为核心、以批判和反思为两翼的文化原动力模型 构建·····	121
(二)文化原动力模型意义阐释·····	123
三、本章小结·····	132
第3章 文化原动力传导机制模型构建 ·····	135
一、文化的实践性定义及其理论和实践意义·····	136
(一)文化研究的新视野:文化的实践性定义和文化动力分类·····	136
(二)文化实践性定义的理论 and 实践价值·····	141
(三)文化动力功能的“具体普遍形式”:文化价值与文化效用价值 ·····	153
(四)社会“异质性互动”与文化“公地悲剧”·····	157
二、文化原动力传导机制、路径及模型构建·····	164
(一)文化流变的四种形态·····	166

(二)基于两个对立价值维度的文化软实力新型分类·····	171
(三)以自由意志为核心、以批判和反思为两翼的文化原动力传导 机制模型构建·····	176
三、本章小结·····	181
第4章 “理想国”与“小国寡民”社会文化原动力及传导机制分析·····	184
一、柏拉图“理想国”文化原动力传导机制分析·····	186
(一)“理想国”文化原动力分析:哲人王是否可以承担起治理 城邦的重任·····	188
(二)“理想国”文化软实力分析:“哲人王”治下的“理想国”是否 “理想”·····	192
(三)《理想国》“五种政制”文化形态分析:五种政制流变的内在 必然性·····	196
二、老子“小国寡民”社会文化原动力传导机制分析·····	208
(一)老子为什么不推出“哲人王”来治理“小国寡民”社会·····	211
(二)“小国寡民”社会文化原动力及其传导机制分析·····	216
三、本章小结·····	219
第5章 美国、德国、日本文化原动力及传导机制分析·····	222
一、以基督新教为核心的美国文化原动力传导机制分析·····	223
(一)美国文化原动力的建构与解构·····	226
(二)“财富供养自由”:美国文化形态分析·····	232
(三)“使人成其为人”:美国文化软实力分析·····	235
二、以“理性”铸就“辉煌”的德国文化原动力传导机制分析·····	241
(一)“理性”的建构与解构:德国文化原动力分析·····	243
(二)德国的“理性”及其流变:德国文化形态分析·····	259
(三)“理性”何以铸造“辉煌”:德国文化软实力分析·····	265
三、以“大和”精神为核心的日本文化原动力传导机制分析·····	273
(一)“大和”不“和”:日本文化原动力分析·····	276
(二)“大和”文化的精神气质及其流变:日本文化形态分析·····	284
(三)“内外有别”的“大和式”思维:日本文化软实力分析·····	288
四、本章小结·····	296

第 6 章 新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文化原动力及传导机制分析 ·····	300
一、基于马克思主义自由观:新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文化原动力分析 ·····	303
二、新中国成立以来国家文化形态分析 ·····	312
(一)“纯”文化态及其体现 ·····	312
(二)“超”文化态及其体现 ·····	314
(三)“合”文化态及其体现 ·····	317
(四)“和”文化态及其体现 ·····	323
三、新中国文化软实力分析 ·····	325
(一)“内敛—认异”的学习力 ·····	331
(二)“外张—认异”的革新力 ·····	334
(三)“内敛—认同”的凝聚力 ·····	338
(四)“外张—认同”的传播力 ·····	341
四、本章小结 ·····	344
第 7 章 结论与展望:文化是否可以成为一门独立科学 ·····	347
一、研究的主要结论 ·····	347
二、研究的主要不足及展望 ·····	353
参考文献 ·····	356

导论 文化长征：一种文化研究的历史回顾

文化路，长征路。文化长征，至少走了五千年。

纵观管理思想史，无论把“人”看成是政治人（亚里士多德，古希腊）、工具人（前管理时期）、经济人（亚当·斯密，1776）、社会人（梅奥，1933）、“自我实现人”（马斯洛，1943），抑或是复杂人（莫尔斯和洛希，1970），这些“人”，都毫无异议地、无孔不入地文化或被文化了。

如果文化一如托尼·本尼特所强调的既是治理的对象又是治理的工具，文化应当被视作一个特殊的“治理区域”，并且需要在文化研究主要问题框架内重新审视“文化”（本尼特，2007），那么，研究管理或治理视阈下的文化首先就必须解决这样两大问题：一是如何“化”的问题，二是以什么“文”来“化”的问题。显见，前一问题涉及的是关于文化的运行机理、机制和基本规律等问题，后一问题涉及的则是整个人类的思想史、文明史和文化史。

在传统中国，从《周易·贲卦·彖传》“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提出以“文”化“天下”的理想伊始，便可以认为已经开启了人类的文化长征。在西方，从苏格拉底、柏拉图把文化视作善意的“谎言”（柏拉图，1986），到马克斯·韦伯对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的关联性做出实质性的阐发，都可以被视为西方文化长征路上的真正文化自觉的重大事件。然而，事实表明，迄今为止，我们既未能全面弄清楚如何“化”的问题，搞清楚“化”的方式、方法、途径、运行机理和基本规律等，也未能完全弄明白应当以什么“文”来“化”的问题。这又进而导致了两个新的“老问题”。一个问题是罗伯特·克利加德1992年在研究文化与发展二者关系的一部著作中提出的：“既然文化如此重要，人们研究文化又已百有余年，为什么我们还没有周全的理论和切实的指导方针，而且没有在研究文化的人及制定、管理发展政策的人之间建立密切的专业联系呢？”（亨廷顿，哈里森，2010）另一个问题是戴维·兰德斯在1998年出版的《国富国穷》一书中提出的：同样的价值观为什么可能会在一些国家因政策不好而受阻，却在别处得到机会而施展？文化对于一国的经

济社会发展究竟起什么作用,起到了多大作用?”(兰德斯,2010)

所有这些问题,又势必导致当前的公共管理或治理研究,大都忽略了这样一个重要事实,那就是,任何的公共性事务的展开都必然地要经由或者是面对文化了的或者是正在被文化的人。因此,新文化观认为,“要把人自身当作文化品来生产,进而通过人把整个世界当作文化品来生产”(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浙江经验与中国发展研究”课题组,2006)。同时,文化产品是一种特殊产品,任何一个文化品即便是纯粹的私有品,其公共性的功能和效用本质上也始终没有被湮没,作为人类文明成果的一种存在或存在方式,其公共性的功能和效用仍然要通过产品本身或其拥有者的价值认同、认知而时时外溢、外现于公共领域。同时,任何文化品均有其看得见的有形作用,也往往还有着看不见的无形作用;而且,很多时候其无形作用比有形作用还要强大,还要深远(吴福平,2014)。从这个意义上说,文化和文化决策的理论性和科学性,相较于任何其他的公共决策,恐怕难度更其大,要求亦更高。文化上十年的破坏,可能百年也难以补救偿还;任何的文化公共政策乃至通常的公共政策的广泛实施,都可能会留下几乎是永久性的文化记忆。因此,有人认为应当慎提文化治理,也有其理由。因为如果是错误的文化治理过程,或者是任由着携带负能量的文化广泛地起着动力的作用的过程,可能正是全社会各个领域创造和活力丧失的过程。特别是由于文化产品无形作用的存在,决策者就必须有敏锐的洞察力以及更高的关于文化和公共文化产品、公共财政、公共管理、社会学、社会心理学、法学、政治学等等,事实上必然要牵涉到方方面面的理论知识储备和理论素养。没有比文化决策更需要慎重对待的公共决策了。因此,开展文化和文化动力研究,搞清楚如何“化”以及以什么“文”来“化”的问题,揭示文化的动力机制、基本规律及其功能和效用等,显见地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一、研究背景与意义

(一)研究背景

文化,可能从来就没有像今天这样,成为一个热议、争议和质疑的话题;同时,也没有像今天这样被摆上了民族国家的重要议题和议程。20世纪四五十年代,西方社会科学界研究文化问题和重视文化的作用曾是主流。后来这方面的兴趣降低了。在过去的30多年,文化研究又有了复兴,正接近于明确提出一个“新的以文化为中心的发展范式,或人类进步范式”(亨廷

顿,哈里森,2010)。现在,越来越多的学者、新闻媒体、政治家和从事发展工作的人,正在把注意力集中到文化上的价值观和态度在促进或阻碍进步方面所起的作用。戴维·兰德斯(1998)在被誉为“新国富论”的《国富国穷》一书中指出:“文化使局面完全不一样。”国际政治现实主义学派创始人汉斯·摩根索(2006)强调:“在影响国家权力的具有决定性的三项人的因素中,民族性格和国民士气是突出的因素,因为难以对它们进行合理的预测,也因为它们对于一个国家在国际政治的天平上有着持久、并且经常是决定性的影响。”马克斯·韦伯把新教伦理看成是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决定性力量。帕森斯和斯梅尔塞(1989)的功能主义经济社会学理论认为,文化对社会具有“系统维持”功能。诺思(1994)认为文化(意识形态)作为一种非正式制度具有节约交易费用的功能,是资源配置的“第三只手”,在无形中引导人们从事社会交往活动;文化是社会或民族分野的标志,它使我们的社会有了系统的行为规范,也是社会团结的重要基础。文化在很大程度上塑造了社会中的人。美国学者约瑟夫·奈(1990)明确地把文化看作国家软实力的核心要素,认为一个国家的综合国力既包括由经济、科技、军事实力等表现出来的“硬实力”,也包括以文化、意识形态吸引力体现出来的“软实力”。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2001年11月通过的《世界文化多样性宣言》中宣称,文化物品和文化服务体现的是特性、价值观和观念,不应被视为一般的商品或消费品。

就转型期的中国而言,我们正处在现代化建设的关键时期,社会发展不光要有经济实力的增长,更需要文化动力的推动。探讨当代社会发展的文化动力,突出文化建设的地位和作用,对于增强我国的综合国力,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意义深远。“当今时代,文化越来越成为民族凝聚力和创造力的重要源泉,越来越成为综合国力竞争的重要因素”(胡锦涛,2007)。我党高度重视文化建设,在十六大、十七大、十八大、十九大报告中都强调了文化建设的重要性,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目标。这表明我党对文化和文化动力的认识日趋深刻。“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强盛,总是以文化兴盛为支撑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需要以中华文化发展繁荣为条件”,“文化是一个国家、民族的灵魂。文化兴国运兴,文化强民族强”(习近平,2013;2017)。当然,仍然需要指出的是,如果说30多年前我们最大的失误是教育;那么,改革开放30多年,其中也有些许偏误,虽然是白璧微瑕,但也值得引起高度重视,那就是文化上的缺失。发端于西方社

会的市场经济,植根于西方文化的经济理性,是一把双刃剑,从来就是善恶并存的。西方的文化研究大家们早已经指出,必须警惕“市场经济沦落为市场社会”,警惕市场经济在人文精神领域,把人们拖进一个“泛市场化”的洪流之中。也正是因为西方社会,几乎陷于“市场社会”和经济理性而不能自拔,英国学者费夫尔曾毫不留情地宣布了“西方文化的终结”(费夫尔,2004)。这是因为,当一个社会不幸沦落为“市场社会”时,必然无视意义、情感、价值,必然就没有了道德、信仰存活的空间,进而,就有可能造成文化的系统性缺失。张保权(2008)指出,“近现代以后,经济、政治、文化之间的关系开始发生新的变化。在革命年代里,政治对社会发展曾经发挥过无与伦比的作用,但随着经济建设的大规模开展,政治的作用开始弱化,经济的作用开始增强,文化的导向作用爆发了出来”。文化动力是一种渗透于人类生活中的以价值为中心,以创新为动力,在社会活动中整合而构成的综合能量。文化动力的形成能促进人们思想观念、生活方式和行为习惯的演进和改变,从而激发人们身上所蕴含的潜能,在现实中焕发蓬勃的生命力,可以极大地促进经济社会的和谐发展(李长健,伍文辉,等,2007)。“文化是贯穿于人类社会始终的动力因素”(李云智,2013)。

(二)研究意义

1. 理论意义

文献调查结果表明,国内外学者在文化动力研究领域开展了大量的研究,取得了很多有价值的研究成果。但是,总体来看,由于当前的“文化”研究,一直“飘零”在各学科的边缘地带(陈立旭,2008)。在西方文化研究史上,自早期的重要代表人物雷蒙·威廉斯之后,文化研究中的两个重要代表学派——法兰克福学派和伯明翰学派,似乎都对给文化概念的准确界定失去了信心,使得“文化”研究陷入了哈耶克(2001)所尖锐批评过的“一种矛盾现象”,即所有关涉文化的研究,事实上正如法律实证主义者那样,跌进了“一门科学竟然明确否定它拥有一个研究对象”的窘境。对于文化概念界定的模糊不清,势必殃及包括文化动力在内的所有关涉文化的研究。从已有的研究看,对文化的运行机制、发展规律,对文化动力的核心要素、传导机制等的研究明显不充分,实证研究也极其匮乏。本研究在梳理国内外学者对文化和文化动力研究的基础上,致力于文化原动力及其传导机制、传播路径、基本规律和实证研究,旨在填补这方面研究的空白,深化和拓展新的以文化为中心的发展范式或人类进步范式的研究,拓宽文化动力研究的理论

视野。

2. 实践意义

中国既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也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党的十八大报告中首次明确提出了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五位一体”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布局。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强调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已经进入新时代。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正在扎实努力,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推进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兴起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新高潮,着力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发挥文化引领风尚、教育人民、服务社会、推动发展的作用。本研究通过分析文化动力的核心要素、作用机制和基本规律,同时通过对柏拉图“理想国”模型与老子“小国寡民”社会文化动力的比较研究,从文化原动力及其传导机制分析的角度来重新审视国家和国家理论的建构问题,试图奠定国家文化动力系统分析的基本框架和基本思路;在此基础上,对以基督新教为核心的美国多元文化动力、以“理性”铸就“辉煌”的德意志精神文化动力、以“大和”精神为核心的日本文化动力以及新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文化动力的核心要素、运行机制、传播路径展开深入剖析和实证研究,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本研究有助于扬长避短,吸收一些发达国家先进的文化理念和文明成果,丰富新时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理论,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建设;有助于更好地发挥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引领作用,更好地理解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历史轨迹和基本规律,进而努力为推进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生态“五位一体”发展提供学理支持和文化支撑。

二、文献综述

国内外学者对文化动力开展了大量的相关研究,积累了丰富的研究成果。本研究从文化和文化动力的内涵、文化动力研究的基本路径、文化动力研究的学科视野三个方面对已有研究成果进行系统整理和归纳。在此基础上,对已有研究进行总结评述。

(一)文化和文化动力的内涵

1. 文化的内涵

“文化”是中国语言系统中古已有之的词语。《周易·贲卦·彖传》：“观

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提出了以“文”化“天下”的理想,可以认为是关于文化和文化动力功能的最早阐述。在古汉语中,“文”即“纹”,有各色纹理交叉之本义。所以,《易·系辞下》上说:“物相杂,故曰文。”《礼记·乐记》中提及的“五色成文而不乱”,《说文解字》上的“文,错画也,象交叉”,也都有相同含义。从词源上看,古汉语中的“文化”即“文治”,与“武功”相对,是指以礼乐制度教化百姓,以期实现文治:“圣人之治天下,先文德而后武力。凡武之兴,为不服也;文化不改,然后加诛。”(《说苑·指武篇》)中国近现代学者关于文化概念和含义的代表性观点有:梁启超在《什么是文化》一文中认为,文化就是心能所开掘、释放出来的有价值的共业(梁启超,2005)。梁漱溟在《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中指出,文化就是人类生活的样法,说到底也就是人的活法(梁漱溟,2015)。蔡元培在《何谓文化》(1920年在湖南的演讲)一文中把文化看成是人生发展的一种情性和情状(洪治钢,2008)。冯友兰认为,文化是一种综合体,即包括历史、艺术、哲学、宗教等等的综合体(冯友兰,1996)。张岱年认为,文化有广义和狭义之分,狭义的文化特指文学艺术;广义的文化则包括哲学、宗教、科学、技术、文学、艺术、社会心理、风俗习惯,等等(张岱年,2004)。司马云杰认为,文化是一个复合体,这种复合体由人类创造的不同的精神和物质形态所构成(司马云杰,2011)。贺麟认为,文化有体、用之别,文化是人化的自然,亦即是经过人类精神陶铸了的自然,精神是文化的“体”,“文化自然”是“用”(贺麟,2011)。

在西方文化研究史上,根据克罗伯等人于20世纪50年代早期的统计,从1871年到1951年,对文化的界说就已经有164种之多。克莱德·克拉克洪在《人类之镜》(1952)一文中,用了将近27页的篇幅,设法对文化进行界说:(1)“一个民族的生活方式的总和”;(2)“个人从群体那里得到的社会遗产”;(3)“一种思维、情感和信仰的方式”;(4)“一种对行为的抽象”;(5)“就人类学家而言,是一种关于一群人的实际行为方式的理论”;(6)“一个汇集了学识的宝库”;(7)“一组对反复出现的问题的标准化认知取向”;(8)“习得行为”;(9)“一种对行为进行规范性调控的机制”;(10)“一套调整与外界环境及他人的关系的技术”;(11)“一种历史的积淀物”。(格尔茨,1999)所有这些关于文化的界说,尽管可能都从某一方面触及到了文化的本质,然而,用了那么多的文字篇幅来描述文化,一方面说明了文化这一概念在界定上的困难,另一方面可能也是对于文化概念界定的绝望。所以,克拉克洪最后求助于比喻,把文化直接比喻成一幅地图、一张滤网和一个矩阵。